

当代

中国翻译考察

(1966-1976)

「后现代」文化研究视域下的历史反思

李晶 著

南开大学 出版社

当代中国翻译考察

(1966~1976)

——“后现代”文化研究视域下的历史反思

李 晶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 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中国翻译考察:1966~1976:“后现代”文化研究视域下的历史反思 / 李晶著.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8.9

ISBN 978-7-310-02994-5

I. 当… II. 李… III. 翻译—语言学史—研究—中国—1966~1976 IV. H159-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32240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肖占鹏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300071

营销部电话:(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022)23502200

*

天津市蓟县宏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7.125 印张 1 插页 200 千字

定价:16.00 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电话:(022)23507125

序

我赞成博士生的论文可作为学术著作出版，因为一篇好的博士论文应该是一本很好的专著，其出版肯定会有助于推动我国的学术研究的发 展。但我却常常不愿意为自己的学生的论文作序，理由之一是在指导论文期间，已竭尽全力，将自己的所知悉数与学生交流过意见，到现在已经似乎再没有什么新东西可说。再者，经过数年认真刻苦研究，论文作者在这一领域已取得相当成就，论文应该是该领域的最新成果，学术攀登的新的 高峰。所以一提到写序，虽体会到学生对导师邀请时的一片盛情，但仍有惶恐之感，实在难以推脱，也只好勉为其难。

李晶写“文革”翻译史，是需要有一点勇气的。南开的博士生，以前写了清末民初的翻译断代史和“五四”时期的翻译断代史，其所写的时代距现在已经过了大约一个世纪。人们对那时的情况虽不能说已有定论，但毕竟已看得比较清楚。“文革”就不同了。它刚刚过去不久，其中好多事情需要分析认识，尤其对那段时间的翻译情况，要能恰如其分地给予定位，确非易事。李晶自己又没有这方面的亲身经历，这使得这项工作难上加难。但李晶做了，而且写出了一篇很好的论文。

这当中的困难之一是材料的收集。“文革”虽然刚过，但有关翻译的材料散乱，没有现成的材料可供使用。为收集和整理材料，李晶可谓费尽周折，所经辛苦只有亲临其境者才能体味。其二是文章的结构安排与写作。对每篇博士论文，这一问题都是非常重要的。但翻译史的写作要夹叙夹议，材料的选择、理论的穿插、各章节之间的次序和衔接颇费心思。第三，最重要的自然就是论文的指

导理论。

李晶写这篇论文借助了翻译研究学派的理论。翻译研究学派扩大了翻译研究的领域，将其从主要是语言学领域扩大到文化领域。李晶进行“文革”翻译史的研究，主要参照了勒菲弗尔等人的翻译受到意识形态制约的理论。“文革”期间的翻译活动受到意识形态的控制是非常明显的，也可以说是非常典型的，用李晶的话来说是“显性”的。在此期间翻译材料的选择受到严格控制，西方文学被定为腐朽没落的文化，即使有人翻译了也没有哪个出版社可以出版。不但选材，而且少量允许的翻译，其所运用的策略也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但由于种种原因，论文对策略这方面的研究还应该更深入一些。

李晶的论文并没有停留在用这种理论指导“文革”翻译史的研究，而是更前进了一步，研究了翻译与意识形态的互动，研究了翻译对意识形态的反作用。这是李晶论文的亮点，完善和发展了勒菲弗尔的理论，更清晰地勾画出了翻译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说明了这种关系的本质以及翻译在人类发展史中的作用。历史清楚表明，翻译不仅仅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奴仆，为其服务并受其利用。翻译还可以通过引进外来的思想和文化，对主流意识形态加以改造，进行限制，甚至可以制造舆论，推动对主流意识形态的颠覆。翻译的政治不等于现实的政治。李晶通过研究明确地揭示了这一点，这是这部论文的重要理论贡献。

有人认为从文化角度对翻译进行研究会妨碍翻译的本体研究，导致翻译研究的“泛文化”倾向。当然，我们不应该也不能把一切都归结于意识形态和政治，但是如果看不到翻译背后起作用的各种因素，看不到一种文化内部的各种关系和翻译所涉及的不同文化间的各种关系，我们也会迷茫，看不清方向。其实，翻译不可能仅仅局限在语言和翻译技巧的领域。脱离了对其背后的各种文化关系的理解，很多翻译现象就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在这方面，我们的工作才刚刚开始，今后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中国翻译史的研究也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很多历史朝代和时期的

翻译史没有专门的研究，我们虽出版了一些有关翻译史的著作，但似乎资料偏多，研究较少，缺乏像西方那样建立在翻译史研究基础上的重点理论著作。可以相信，以中国丰富的翻译史资源为土壤，史论结合，中国的翻译理论研究园地就一定能结出更加丰硕的果实。

崔永禄

2008年6月

前 言

本书从“翻译的政治”这一“后现代”文化研究视域对“文革”时期的中国翻译活动进行全面梳理和整体考察,内容主要关涉翻译赖以产生的社会—文化语境的特征、翻译活动的整体状况、特定语境下的译作存在形态和译本特色、赞助人和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以及译本的阅读和接受等。关注的焦点在于特定社会—文化系统中的政治意识形态特征,政治意识形态如何在宏观上操控翻译活动,翻译活动对政治意识形态的潜在反作用是什么,翻译在这一特定时期的社会—文化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

第一章主要根据“文革”这一政治背景,对本研究中的“文革”时期进行时间上的界定,并将其划分为两个阶段;概括出“文革”时期中国翻译活动的总体特征。

第二章介绍“文革”时期翻译活动赖以发生的语境;以实证研究的数据图表展现出“文革”时期翻译出版的整体状况;廓清“文革”时期译作的产生及相关翻译活动的趋势特点。

第三章本着“译史研究,以人为本”的原则,对“文革”时期双向翻译活动的赞助人、译者以及“文革”背景下外译中著作的读者以及他们各自在翻译活动中的身份和作用进行系统考察。

第四章选取了“文革”时期外译中和中译外一些典型译本,从“译本选择”、“翻译策略”、“译作评论与教授”三个方面分别分析和研究“文革”政治背景下双向翻译的译本特色。

第五章是前四章内容的理论层面上的升华。以“翻译的政治”为主线,对“文革”时期翻译行为的“本性”进行了论证,主要涉及双重权力话语对翻译的影响、翻译活动的双重追求和潜在效应,继而总结出“文革”时期政治意识形态与翻译行为之间的互动关系。

第六章对全书研究结果进行了总结,在此基础上探讨了翻译在“文革”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社会—文化大多元系统中边缘抑或中心的位置问题,特别是翻译对当时社会/文化系统的冲击和影响、“文革”时期的中国翻译在20世纪中国翻译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最后将“文革”翻译断代史的研究与西方“文化学派”的翻译理论相联系,指出现有西方译论的适用性和局限性。

研究表明,在政治文化极度泛化的“文革”时期,外译中和中译外翻译活动充分证实了政治意识形态对翻译行为的极端操控,前者对后者的压制、破坏等负面作用是巨大的、呈压倒性的。但与此同时,外国著作的内部译介,通过特殊的地下读书活动,给国人带来了思想启蒙和精神冲击,因而对当时极端化的政治意识形态具有潜在的、一定程度上的“消解”作用;而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然科学著作的相对大量译介,对当时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也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继而也有助于对极端化政治意识形态的“消解”。“文革”时期,相对于政治意识形态,翻译这一多元系统自然处于社会—文化大多元系统的边缘位置,而就翻译活动在当时整个社会—文化大多元系统中发挥的潜在作用而言,翻译的边缘地位之说却也很难成立。对于翻译在“文革”时期社会—文化大多元系统中边缘抑或中心的位置的问题,是不宜下定论的。

据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1)“文革”十年是中国翻译史上的萧条期和沉寂期,但并非“空白期”,作为中国翻译史上一脉相承的一个阶段,它既不能被割裂,也绝不容忽视。“文革”这一特定时期一些翻译行为的特殊社会价值,即翻译对当时的社会—文化系统所造成的冲击和影响不容小觑。当然,“文革”这一非正常时期主流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极端操控,对整个中国翻译事业的发展所造成的压制、破坏等负面影响之巨大是绝对不容置疑的。(2)西方译论,特别是“文化学派”的翻译理论总体而言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和适用性,对于中国翻译(断代)史研究,具有解释力和借鉴意义。但由于产生语境的不同,这些西方译论与“文革”翻译史的研究也存在不能契合的地方。在中国翻译(断代)史研究的基础上反思西方译论,特别是“文化学

派”翻译理论，又可以发现其不足，尤其是勒菲弗尔的意识形态理论，对意识形态的政治内涵过分偏重，同时只关注意识形态对翻译行为的操控，而忽视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尤其是翻译行为对意识形态的（潜在）反作用。

“文革”时期翻译史研究，是一个题材重大，难度也很大的研究课题。笔者不揣冒昧，对那段历史中的翻译活动进行梳理和考察，旨在抛砖引玉，引起学界更多同仁对这一课题的关注和研究。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局限，书中一定有不少疏漏乃至失当之处，敬请读者不吝指正。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文革”翻译史研究缘起	1
1.1.1 “文革”翻译史的时间界定	1
1.1.2 “文革”时期中国翻译的总体特征	3
第二节 “文革”时期中国翻译的研究现状	6
1.2.1 文献综述	6
1.2.2 文献总结	18
第三节 研究意义与研究方法	21
1.3.1 研究意义	21
1.3.2 研究方法	25
第二章 “文革”时期中国翻译概貌	29
第一节 翻译活动的语境变量	29
2.1.1 政治局势	30
2.1.2 外交格局	30
2.1.3 文艺动向	32
第二节 翻译出版的总体状况	34
2.2.1 整体趋势	34
2.2.2 外译中出版趋势	36
2.2.3 中译外出版趋势	42
第三节 翻译活动的趋势特点	44
2.3.1 对内译介	45
2.3.2 对外译介	52
第三章 “文革”时期中国翻译的“人本”研究	56
第一节 翻译的委托和组织者——“赞助人”	56

3.1.1	赞助人与主流政治意识形态	57
3.1.2	赞助人的作用	58
第二节	翻译的主体——“译者”	65
3.2.1	谁为“译者”？	65
3.2.2	目标文本建构过程中的译者主体性	69
3.2.3	译者与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和赞助人之间的 权力关系	75
第三节	翻译的目标受众——“读者”	78
3.3.1	特殊年代的读者	78
3.3.2	没有空白——翻译与地下读书运动	79
3.3.3	读者的解读：禁书年代里的“审美偷渡”和 “心灵反叛”	83
第四章	“文革”政治话语霸权下的译本特色 ——翻译的文本变量考察	87
第一节	译本选择	88
4.1.1	外译中作品的主要内容及译介动机	88
4.1.2	中译外作品的主要内容及译介动机	96
第二节	翻译策略	101
4.2.1	文本的翻译形式	102
4.2.2	译文的遣词造句	103
4.2.3	加注和删改	106
4.2.4	集体翻译与特殊署名	109
第三节	译作评论	112
4.3.1	译本的政治化解读	113
4.3.2	工农兵对文学译本的阐释	119
第五章	“翻译的政治” ——“文革”时期中国翻译的“本性”探索	123
第一节	翻译的政治与现实的政治	124
5.1.1	“翻译的政治”	124
5.1.2	翻译的政治与现实政治的“重合”	125

第二节 双重权力话语制约下的翻译活动	128
5.2.1 有形权力与翻译	129
5.2.2 无形权力（意识形态）与翻译	130
第三节 翻译活动的双重追求和潜在效应	138
5.3.1 翻译活动的双重追求	138
5.3.2 翻译活动的潜在效应	141
第六章 结语	152
第一节 研究回顾总结	152
第二节 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中翻译的定位	154
6.2.1 文化稳定期与文化转型期翻译活动的 “分水岭”	154
6.2.2 翻译在“文革”时期社会—文化大多元系统中的 位置：边缘抑或中心？	160
第三节 “文革”翻译史与西方译论：阐发与思辨	163
6.3.1 “文革”对中国译学研究的影响	163
6.3.2 从“文革”翻译史研究看“文化学派”的 翻译理论	165
6.3.3 译史研究方法论——由《翻译学归结论》 所想到的	169
第四节 余论	172
附录 1 “文革”时期典型译本扫描图	176
附录 2 1966 年至 1976 年出版翻译著作概况统计分析	181
参考文献	192
后记	210
作者简介	213

第一章 绪 论

忘记过去就不能把握未来。

第一节 “文革”翻译史研究缘起

1.1.1 “文革”翻译史的时间界定

本书中的“‘文革’时期”是指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1981年6月27日一致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19)条明确了“文化大革命”的时间是“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据此,本书研究的时间范畴即以“文革”这一政治事件的起止年份为界。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现代历史上一场空前的政治浩劫和内乱,历时整整十年,对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文革”从一开始就以文学艺术作为其主要批判领域之一。虽然说,作为一个政治时间概念,“文化大革命”指的是从1966年《五·一六通知》¹的发出到1976年10月“四人帮”下台这段时间,然而,作为翻译活动

¹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要求“全党必须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所依托的大的政治文化背景，这一时间概念的界定未免过于狭窄。实际上，“文革”极“左”思潮在20世纪60年代初即已露出端倪，一直延续至1978年的改革开放，只是这种极“左”思潮在1966年至1976年的十年间达到了极端而已。为翻译研究的整体性起见，本书的研究以“文革”这一政治背景为依托，将“文革”时期的中国翻译史从时间上界定为1966年至1976年。其间，政治意识形态得到强化，甚至是极端化。作为一种文化政治行为，翻译活动与政治意识形态的粘连尤为明显。但是，这十年“文革”翻译史又不能割裂开来，必须从20世纪60年代初至1966年“文革”爆发和1976年“文革”结束至70年代末改革开放的“文革”“绵延期”来对其作整体观照。

“文革”十年，我国的翻译活动大略可分为两个阶段（为叙述方便起见，以下简称“‘文革’第一阶段”和“‘文革’第二阶段”）：

“文革”第一阶段（1966～1971）：据史料显示，从1966年5月“文革”爆发到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¹，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大革命”，或者叫原生形态的“文化大革命”。²在这一阶段，所谓“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实行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等基本原则被贯彻得最充分、最彻底，而文化领域在这一阶段所遭受的破坏最严重。

“文革”第二阶段（1972～1976）：从1971年“九·一三事件”结束到1976年“四人帮”下台，这一阶段是“文化大革命”的延续阶段。“‘九·一三事件’促使人们从个人崇拜的狂热中觉醒，成为‘文化大革命’历史发展的一个转折点。”³“九·一三事件”之后，政治气氛缓和许多，国家方针政策做出了重大调整，使得包括文化领域在内的整个局势有了明显好转。

这一切也自然导致了两个阶段翻译活动的不同特征。

可以说，“文革”期间，中国的文学艺术活动一直浸泡在浓重的

1 指林彪集团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阴谋败露后，于1971年9月13日乘飞机外逃叛国，途中机毁人亡的事件，又称“林彪叛逃事件”。

2 参见高尚斌：《关于“文化大革命”阶段划分的浅见》，《党史研究与教学》，1994年第6期，第63～65页。

3 参见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第245页。

政治氛围之中，对与文艺毗邻的翻译的命名不能不考虑政治因素，对“文革”时期中国翻译史的阶段划分也自然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然而，我们也不能囿于政治意识形态的藩篱，而忽视对翻译本身特性的考察。

“从1966年至1976年的10年虽然称之为‘文化大革命’时期，只是因为‘文化大革命’是这10年独有的，用以同其他历史时期相区别，而绝不是说，这10年间除了‘文化大革命’之外，没有做其他任何事。恰恰相反，建国后其他时期所进行的工农业生产、基本建设、教育和科研、文化和卫生，以及社会消费等人类社会维持正常生活不可缺少的一切，这10年也照样都是有的，只不过是打上了‘文化大革命’的烙印罢了。”¹因此，对于这十年的历史是不能简单笼统地全盘否定的，这也应该是对“文革”时期中国翻译研究的基本原则。

1.1.2 “文革”时期中国翻译的总体特征

在政治文化极度泛化、政治意识形态极端化的“文革”时期，翻译成为在主流政治意识形态严厉操控下，按照权力意志的要求进行的一种行为。外译中和中译外的翻译活动充分证实了政治意识形态对翻译行为的极端操控。翻译活动的组织不是从整个社会的思想和文化变革的需要出发，而是从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需要出发。这样的翻译组织方式下所产生的翻译活动呈现出以下鲜明特征。

1. 译作的出版和存在形态

在翻译活动极度凋零的情况下，翻译著作的出版成为体现该时期翻译状况的一个主要方面。而“文革”时期翻译刊物大多停刊，翻译单行本的出版因此成为体现该时期翻译出版特征的典型代表。

“文革”时期，翻译出版沿袭了建国以来以官方出版社为中心的翻译出版体制，翻译的选题、译者的选择、译作的审查和出版等，均由专门机构统一组织实施、严加控制。

在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强烈掣肘下，“文革”时期中译外作品全

¹ 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第360页。

部为公开发行，而外译中作品以公开和内部两种形式出版，译作的存在形态分为：公开译作、内部译作、潜在译作（“文革”时期翻译，但因“文革”而搁浅的作品）。

2. 畸形的翻译格局

首先是翻译数量少。据笔者的统计，1966年至1976年共出版翻译著作2912种，其中外译中著作1779种（公开发行1128种；内部发行651种）；中译外著作1133种，翻译出版量呈历史最低点。如中国翻译史的其他历史时期一样，“文革”时期的外译中数量也多于中译外的数量。然而第一阶段，中译外数量却明显多于外译中（主要体现在毛泽东著作和其他政治著作的外译上）。其次是类别单一、集中。一元化的政治意识形态导致了文化语境对翻译择取的单一化价值取向，即政治实用主义和工具化。

在外译中方面，二元对立的政治思维模式（凡资本主义国家的都是腐朽的，凡社会主义国家的都是先进的）使得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学和文化，多采取拒绝或批判的态度，对于与政治意识形态粘连尤为紧密的外国文学的译介，多以作品的思想性作为译介与否的首要的、甚至唯一的标准。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翻译选目的操控尤为明显，主要译介的是苏联和其他主要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亚非拉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作品，欧美现代文学作品基本被拒之门外。因此，“文革”时期的外国文学翻译在数量上明显低于非文学翻译。

尽管“文革”时期的翻译活动受到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强烈掣肘，但外译中社会科学（包括文学）和自然科学在数量、来源国等方面表现出显著差异。社会科学（尤其是文学）译介为数不多，且大多来源于苏联和其他主要社会主义国家，基本上成为服务于当时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工具，鲜有突破这一限制、完全在文化积累的意义上发挥作用的译介内容。而自然科学的译介，相对于“文革”时期荒芜的翻译境况，数量上相对显得较多，且来源国多为在社会科学，特别是文学翻译上被排斥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在中译外方面，“文革”时期大量译介毛泽东著作和其他相关政治著作（特别是在第一阶段）；文学翻译则主要集中在宣传新中国、特

别是“文革”时期的“大好形势”和社会面貌，以及反映阶级斗争的题材方面。可以说，“文革”时期的中译外出版状况，是当时政治、外交和文艺形势的高度、集中体现。

3. 独特的翻译现象和译本特色

“文革”时期出版的翻译作品很多都是重译、重印或再版的，只有少数为“特殊译者”新译的。这一时期，许多翻译家被迫辍笔，“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的翻译队伍和“集体翻译”的方式应运而生。这些特殊的翻译现象使得“文革”时期的译本特色除在遣词造句等语言转换层面上有所体现外（主要表现为意识形态的一种潜在导向），更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署名：集体署名或表示集体合译的共用笔名或无署名（中译外著作多未注明译者）。（2）导读性文字：由译者或由出版者撰写的前言、后记等说明文字（中译外著作还常配有毛主席语录译文），外译中著作还多配有由工农兵撰写的评论文字。这些文字措辞强烈，带有鲜明的“文革”政治特色。（3）加注和删改：带有明显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立场的译者注也偶尔出现在外译中著作中；一些外译中著作中存在删改现象。

此外，“文革”时期出版的外译中著作由于时代的局限，还存在着节编、转译等特殊形式。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政治意识形态严厉操控翻译活动的同时，“文革”时期外国著作的内部译介，通过当时特殊的地下读书运动（阅读内容主要包括“文革”之前即以流行的“黄皮书”和“文革”期间的“白皮书”），给当时的国人带来了思想启蒙和精神冲击，因而对当时极端化的政治意识形态具有潜在的、一定程度上的“消解”作用。此外，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然科学著作的相对大量译介，对当时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也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继而也有助于对当时极端化政治意识形态的“消解”。此外，中译外著作中也有些文化积累意义上的对外宣传中国文化的内容，尽管其主要动机是对外传播意识形态。

在“文革”这一中国历史上的非正常时期，极端化的政治意识形态对翻译行为造成了极大的压制和破坏，中国翻译经历了有史以来的最低谷。“文革”十年，翻译处于萧条和沉寂期，但也并非一片空白。